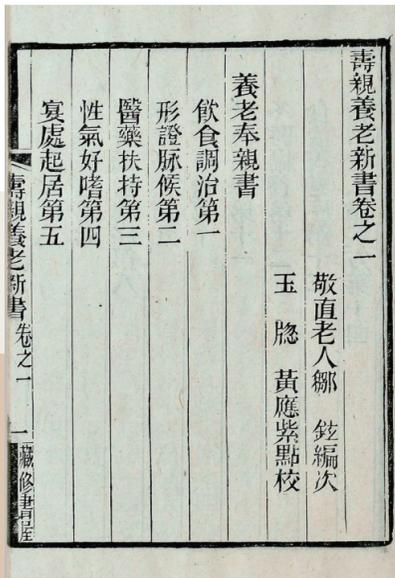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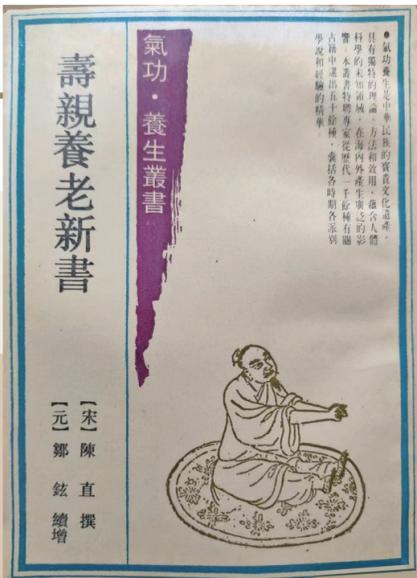


文化档案

元代养生大家邹铉「官总管」考

●童杨



《寿亲养老新书》是中国最早的古代营养保健学专著。

管。元靖四世孙。”
“官总管”，这“总管”究竟是多大的官职？很多人认为，这是个没有品级的官职。可想想，邹铉乃举人出身，他所任的官职应该不是高门大户或县衙衙门中小小的管家、管事之类的职务，况凡写入县志选举制中的人物，应该都是有品位的，怎么可能写个没有品级的官职呢？

查“总管”这一词条，历史词典解释为：1.元朝诸路设都总管、总管，位次达鲁花赤（掌握各级行政和军事实权的最高长官），上路正三品，下路从三品，管理民政。2.管理专门事务的长官。元代有不同名称的都总管府、总管府，如工部所属，掌管全国工匠的诸色人匠都总管府、诸路杂造总管府；宣徽院所属，供内府食用之一的淮东淮西屯田打捕总管府；掌管地区赋税的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；织染杂造人匠都总管府等等，都以都总管、总管为长官，秩正三品、从三品。

对这一解释，我颇有些疑惑。查找《元史·百官志》（中华书局）：“管领随路打捕鹰房民匠总管府，秩从三品”“随路诸色民匠打捕鹰房等户都总管府，秩从三品”“管领本位下打捕鹰房民匠等房都总管府，秩正三品”“诸色人匠总管府，秩正三品，掌百工之技艺。至元十二年始置，总管、同知、副总管各一员……后定置达鲁花赤一员，总管一员”“诸司局人匠总管府，秩正三品。达鲁花赤一员，总管一员，副达鲁花赤一员，同知一员，副总管一员……领两都金银器盒及符牌等一十四局事”“随路诸色民匠都总管府，秩正三品。掌仁宗潜邸诸色人匠”等等。

也就是说，元朝官员品级中，总管确为正三品或从三品。

徐厚冰在《广德达鲁花赤考》中写道：“元至元十四年（1277年），改广德军为广德路，路设总管府领广德、建平两县，属江浙行中书省。据宋濂《元史·百官志》载：‘诸路总管至元初置（广德）下路（十万户以上为上路，十万户以下为下路），置广德达鲁花赤一员，总管一员，秩从三品；至元二十年（1283年）置同知、判官各一员。’关于达鲁花赤，光緒《广德州志》是这样阐述的：‘路县俱置达鲁花赤，以蒙古色目人为之，篆监临，俗亦为谓之监州，以汉人、南人为副之，皆称总管。’”

两相对照，可知“总管”应该是个品级不低的官员，工作范围“掌管全国工匠的诸色人匠、诸路杂造、管领随路打捕鹰房民匠、管领本位下打捕鹰房民匠”等等专门民政、事务性工作。

在元朝，部族（人）分为四等，即蒙古人、色目人、汉人、南人。汉人与南人又有区别。赵翼在《二十二史劄记》中说得很清楚：“金、元取中原后俱有汉人、南人之别，金则以先取辽地人为汉人，继取宋河南、山东人为南人；元则以先取金地人为汉人，继取南宋人为南人。”如是，邹铉应属最低等的“南人”。

《元史·百官志序》中记载：“诸官职皆以蒙古人为之长，而汉人、南人贰焉。”就是说，元朝制度，百官皆蒙古人为最高长官，虽省部、台院等皆用南人，多无实权。赵翼在《二十二史劄记》中说：“至元二年，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噶齐（即达鲁花赤），汉人充总管，回回人为同知，永为定制。”

元统一中国后，当时蒙古、色目人与汉族又互相仿效，更易名姓，氏族淆惑，最终同化于汉族。如赵翼在《陔余丛考》中记载：“赵荣，其先本西人，元时入中国，家闽县，遂为闽人，如此类者甚多。”再如，元末明初回回人定定，据清·乾隆版《泰宁县志·官师志》记载：“定定，高昌人。洪武九年任。尚行实、敦风化、作土气，凡公署、学舍、坛场多所修建。时设屯田，定谕民视垦土先期耕治之，俾陇有勤犁迹。及使臣巡视，则皆业有主也，不可以屯。郡属皆有屯田，惟泰独无屯军之忧，至今赖之。升广德（今安徽广德县）同知，致政归，因家泰宁，民为营葬。祀名宦。”

蒙古人主中国，实为民族大混合、大融合时期。正好印证了柳诒徵在《中国文化史》中所说：“观于宋人之衰弱，几疑中国之文化实足为国家种族之害，反不若野蛮人种之尚武，可以凌驾文明人种之上。然试考诸国之历史，则其事殊不尽然。凡异族之以武力兴者，率多同化于汉人之文教，即其文字有特创者，亦多出于华文，此则文化不以种族而分之证也。”

综上，邹铉“官总管”，官级应该是正三品或从三品。元朝建有元大都（今北京）、元上都（今内蒙古正蓝旗东），而元中都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北县馒头营乡，始建于元大德十一年（1307年）。以此推论，邹铉是在完成《寿亲养老新书》的两年后，才去中都任总管的。若真任中都总管，那时他已近70岁了（邹铉高寿，享年约83岁）。

邹铉究竟何时就任中都总管？笔者查阅所能找到的资料和《邹氏族谱》，都没有标注。至于在哪个部门或哪一路任总管，也就不待而知了。当然，对“总管”这一官职，许多人尚有疑问，期待大家见仁见智，把这一问题弄个清楚明白，那是最好的。

三明掌故

蒸栗糕，饮姜酒

——大田重阳强身秘笈

●林生钟

重阳，登高、饮菊花酒、戴茱萸，在西汉就有这个习俗。登高能健身，饮菊花酒延年益寿，佩茱萸有驱虫、除湿和逐风邪等药用功能。大田人过重阳，也有类似的习俗。

大田县“居万山之中，崇岗峻岭抱城而峙。草木蒙茸，山岚四塞。其气阴以燥（热）人，触之多疴，土人御之以姜酒。”清代知县叶振甲所作《瘴气歌》中写道：“……何法消除使廓清，毒氛永不将人沁。旧传两粤仗檳榔（粵人食檳榔辟瘴气），闻土将何立禁方？见说晨趋旋病疴，闭门深坐任茫茫（清晨行瘴中多病疴）。”《后瘴气歌》写道：“闻道浪黔及楚粵，瘴气易生亦易没。闻地清晨不见天，时移已午方渴歇。陆行迷路水迷波，冥触更虑豺狼多。居停留客且暂驻，姜辛酒旨除烦苛（闽俗，晨饮姜酒以御瘴气）……”

明代重阳节大田人“蒸栗糕，饮茱萸酒，以辟恶气”，清朝康熙年间过重阳节“蒸栗糕，饮茱萸酒。土民登高汛酒，以辟恶气”，这些习俗与当地地方上的气候和预防疾病有关。民间，部分父母这天请道士给幼童过“重阳关”，祈福孩童平安、健康成长。

重阳时节还有“蒸栗糕”，人们在新谷归仓后，用新米磨浆，掺入了葱油、食盐等调料，倒进竹匾在热锅里蒸熟，等蒸熟了一层后继续倒上一层米浆，足足做成九层厚。这就是大田名小吃“九层糕”，或称“九重糕”。

重阳登高，在大田民歌或者农谚里传颂。后路的广平一带，子孙兴旺的长寿老人过世，家中女眷不兴悲啼，用唱《十盏油灯》掉歌代替。其中第九段词唱道：“九盏油灯菊花灯，重阳登高望亲人，九姐九妹上香拜，秋尽霜天满地银。”节气谚语预测天气：重阳晴，禾晒垵；重阳无雨看十三，十三无雨一冬晴；九月三九（初九、十九、廿九）晴，不如十月二十晴，十月二十晴，盐油柴米烟平（物价稳定），主好年尾景，风和日暖雨顺；九月九那日，无用查母（不勤快的女人）三顿打直（忙不过来）等。

重阳节定为中国老年节后，大田城乡各地每年开展尊老、敬老活动，尊敬老人的风气浓郁，逐渐形成了新的习俗。

登高滚窠

——建宁的重阳旧俗

●宁江炳

重阳节，是敬老节，也是登高节。

旧时，建宁城乡家家磨浆做糕，名为层层糕，寓意“日子节节高”。如果天气晴朗，饮过茱萸酒后，大人带领小孩，赴城西西堡山登高，或放飞纸鸢，或赏菊花，或到霸王窠滚窠，尽情欢乐。

建宁县城的西门有几个小山头，旧时统称为登高山，西门城墙就筑在这山上，这几个小山头围成一个山窝叫霸王窠，窠里既无竹木荆棘，也没有碎石砖块，且坡度倾斜，绿草丰茂，到了秋天，其间还点缀着美丽的茱萸花，草地绵软如同覆盖了一层绿色碎花棉被。

过去，每年重阳节，建宁县城相关人士，多有结伴到城西霸王窠登高的。据说是效法古代桓景重九登高避灾，希望消灾降福，也有效仿大诗人王维登高采茱萸花吟诗作对寄寓情思的，“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”。其实，秋高气爽，登山游览，既可陶冶情操，又能锻炼身体，是一项有益身心的活动。不过，建宁建宁的这项登高活动，却伴有一种独特的活动——滚窠，即拖（推）人跌跤，从山地高处往窠里滚，常常是一班青年喜欢开玩笑，每乘登高人没有防备，突然拖（推）人跌倒滚窠，引起大家的欢笑。因此地的土质松软，丰草如被，从未跌伤人，所以大家放心地在这里滚窠取乐。多少年来登高滚窠的活动就这样流传下来，成为一种风俗。

有些事情也不是永远那么顺的。据建宁文史资料记载，在清朝，建宁的登高活动，就有过县衙师爷登高被拖而恼羞成怒，要抓人恶办的事，后来地方人士婉言解释，这是本县自古以来有滚窠祈福的意思，师爷才转怒为喜，以为自己将好运发福，而未施淫威。

而另一件事的结局却不是那么幸运地了。民国十二年（1923年）重阳节的下午，来霸王窠登高滚窠的红男绿女布满山头，滚窠摔倒引出的欢笑此起彼伏。正当大家玩兴正浓时，一位后生将一身便装的外地人推倒滚窠，此人是当时北洋军驻防部队的军官，他认为那后生是欺生，侮辱他，爬起来后大发雷霆，并挥手向推他的后生打去，以致引发一场争吵斗殴。军官寡不敌众，败下阵去，留下一句“有种的等着瞧”，就一溜烟直奔城里武门衙，纠集士兵数十人，跑步赶到霸王窠，见人就打，登高群众见来者不善，便四散而逃。可怜一些幼儿、老人，跑得慢些，不是被打伤，就是被踩伤，一时整个霸王窠号哭声惊天动地。随后，城内秩序也跟着大乱，店铺关门，人家闭户，街门冷清萧条，像是战争动乱时的荒凉情景。最后，还是由地方人士托人到县衙陪礼说情，事态才平息下来。不过，重阳节的滚窠风俗从此一蹶不振。

后来，建宁西门的几个登高山，因县城的发展需要而推平了，成了建宁一中的大运动场。滚窠的习俗停止好几十年了，但当地老年人，每逢重阳节时，仍然会回忆谈及。而现在，建宁的许多青年人仍热衷于登高健身，不过他们瞄准的是金铤山、九县石这样的大山，正所谓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。

乡愁新话

我村也有“村史馆”

●邱林根

巍巍莲花山下，一座座灰褐色的民居错落有致；那条清澈激越的溪流，在村前拐了道弯……这便是清流县嵩溪镇塘背村的上坑亭自然村。

2023年7月12日（农历五月廿五，五谷真仙生日）早上，上坑亭“农耕文化陈列馆”成立。它属村中江氏老屋，与玉华书院毗邻。大门上赫然写着“农耕沃野千畦绿，鹤闹腊梅万朵红”的对联。馆主江天德先生说：“创建这个‘村史馆’，就是要让它成为留住乡愁、激活记忆、传承文化的重要场所。”

这座长方形的简陋平房，泥墙、黛瓦，原是吃大锅饭年代的集体仓库。门前偌大的晒谷坪，就是当年农业社晾晒、开

会的地方。

走进农展馆，一副副谷箩、谷笕；蓑衣、斗笠；木犁、铁耙；风车、谷桶；石磨、石臼……历历在目，记录着村民“风里来、雨里去”的春种秋收。镜框里，破败的猪寮、牛栏；散落的饭甑、箬篱……一张张黑白照片，存放着村民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”的峥嵘岁月！在“立夏丸”图片前，我喃喃细语：“推磨的母亲，走啦！你看我脸发麻，想吃豆花……”

村史馆沉淀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。土地承包以来，村民从吃得饱到吃得好，从没有酱油、味精的青菜、芋子，到有菜有汤的鸡鸭鱼肉，见证着乡村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。

村史馆勾勒着乡村振兴的图景。从扁担挑、板车拉、摩托车载，到小车、大车普及，呈现出山村交通的巨变。开作坊，搭花棚，公益林补偿款，村民入股分红……一批批实物，一桩桩实惠，见证了家庭经济的日子日新月异。

村史馆承载着几代人的乡愁。随着科技发展，农业生产方式不断转变，机械化代替了牛马耕作，标准化代替了手工生产，将过去的生产、生活工具收集、保存起来，为后生留下看得见、摸得着的记忆，功莫大焉！

村史馆有真切的民声民意。一次，小组会，组长从抽屉里拿出当年出工吹奏的海螺，“嘟嘟嘟”的几声把村民逗乐了！大家仿佛听到集结号，你一言、我一语，汇成了共同的心声：“没有共产党，哪来今天的好日子啊？”朴素的话语，表达了群众感恩、听党话、跟党走的心情。

村史馆浓缩着过往，映照当下，寄托着未来。它将以独特的文化符号镌刻着时代发展，助力赓续乡村文脉，源源造福于民。